

萧乾的帽子 文洁若的水桶

张昌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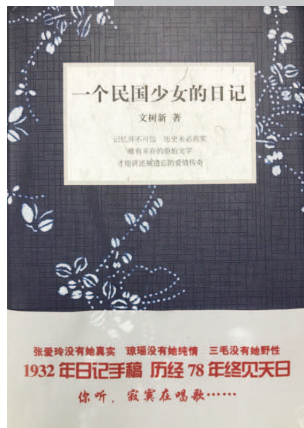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开心地挥舞文洁若赠送给他的萧乾的帽子



▶文洁若(左)与记者柳琴在萧乾照片前留影

树新的日记
▶文洁若自费出版了二姐文



▶文洁若(左)与记者柳琴在萧乾照片前留影

萧乾慈眉善目、天性率真，他的厚道圆融，有时被人误读为“圆滑”。1956年巴金进京开会，曹禹请客，他问巴金想请谁作陪，巴金说萧乾等。餐毕，曹禹去柜台结账时发现萧乾已悄悄把账结了，曹禹很尴尬。后来有人提起萧乾时，曹禹云此人“滑”，并在文章中说萧乾“滑得像泥鳅”。实则萧乾厚道迂阔，胆小出名。文洁若曾亲口对我说，自1958年邵洵美因寄到香港的信被截获而坐牢后，萧乾与海外友人通信都留有底稿。人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萧乾是别人被蛇咬，他也怕井绳。

廖托知己，萧乾是我的恩师，教我为人作文，我已写过多文，不再赘述。

萧乾健在时，我只为他与文洁若出过一本《旅人的绿洲》，倒是他过世我退休后，我为他选编出版过《往事三瞥》《文学回忆录》等四本。去年我又为他们夫妇编了本随笔合集《砚田内外》(商务印书馆，2018年)。

2018年末，我进京看望文洁若，一是送去为她写的册页，二是送《砚田内外》样书。这是萧乾作古后我第三次见文先生，世事沧桑，一切与当年都不同了。其居所原先二大套连在一起，因儿女均在美国，萧先生走后，文先生觉得一人住那么大房子太奢侈，处理了一套，保留了靠里面的一个单元。91岁的文洁若尽管腿脚稍不灵便，但健康状况不错，仍坚持独立生活，买菜，做饭，创作。她素来不喜欢用保姆，曾对我说：“我写东西就怕有个人在面前晃来晃去，只要我还能动，坚决不找阿姨。”显然，家中陈设比以前要乱得多，客厅中央堆满书刊等杂物，上面覆盖着塑料布，像个小仓库。办公桌仍是当年萧乾译《尤利西

斯》时那张自制的写字台，桌上堆满书报、文具、食品，甚至还有饭后尚未来得及清洗的碗筷。文洁若只垫伏在那书桌可伸缩展开的一块木板上写字。

文洁若的勤奋与认真，实在令人动容。我请她在《砚田内外》上签名送我，她用繁体写，忽然停下，说我名字中的“华”繁写记不得了。我说简写算了。她说不行，“张”字已写成繁体，若“华”字简写就“体例不一”了，坚持搬出大字典，一笔一画写上。在翻阅样书时，她忽然发现一幅照片注文把她大姐的名字排错一个字，说要改过来。我说你用笔改一下得了。她说那样很难看，于是便从案头抽屉里找出修正带，然后将那错字消去重写。

为钤印，文洁若带我到卧室取印泥，我发现书架上下二层堆满了积满灰尘的《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这是本有故事的书，我读过，是文洁若二姐文树新的日记，一曲凄美哀婉的青春恋歌。1932年，在孔德学校就读的15岁的文树新与教她文学课已有家室的Y先生(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个参加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名人)产生了恋情，两人私奔上海，三年后18岁的文树新产下一女，月子中不幸患上猩红热香消玉殒。前些年拆迁，Y先生后人在老房子屋梁上发现一大包文树新当年的日记，文洁若得知此事后很伤感，觉得二姐在世界上没留下任何痕迹，坚持自费把这部日记出版了(九州出版社，2010年)。文洁若靠一己之力，推销了大部分，剩余的仍堆在家里。此书出版之初，我略尽绵力帮其推销了一点，没想到还库存这么多。于是，我马上提出再买10本，请她签名，分送爱书的朋友。文洁若听

了之后很高兴，说：“你帮我减轻负担，好呀！”于是，她逐本签上自己和弟弟文学朴的名字。有趣的是，桌面笔筒里有一大把圆珠笔，可抓了一支写不出来，再抓一支仍出水不畅，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支可用的，她签名我钤印。

忙毕，文洁若问我可不可以陪她上趟银行，我说当然可以。我见她坐在门口小圆凳上换鞋，腿很难蜷曲上来，这很危险，圆凳没有扶手，如果跌倒就麻烦了。我赶忙蹲下去，帮她把鞋脱下，把毛线袜脱掉，再换上轻便皮鞋，系上鞋带。文洁若连连说：“难为你了，难为你了。”我说：“应该的，应该的。”说真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帮母亲脱过袜穿过鞋呢。因腿脚不便，文洁若已拄拐，我扶着她一步一拐，穿过长长的楼道，坐电梯下楼再过马路，步履蹒跚好不容易走到她开户的那家银行。回来的路上，她让我不要扶她，把钥匙递给我，叫我去开门，说别耽误我的时间。

文洁若虽是大家闺秀出身，但历来俭朴，她一年四季的衣服似乎只有两种颜色：蓝或黑。印象极深的是，20多年前我到她家，见有好几只塑料桶用来装水，其中有一只还断了把手。一水多用，淘米水留下洗菜，洗衣水留下拖地。又油然想起2000年8月，《光明日报》记者柳琴与我一起陪她到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接受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给她授勋的事。那天她身着一袭漂亮的旗袍，戴着珍珠项链，脚穿锃亮的白皮鞋，手拎一只漂亮的小手包，好风光。在回来的路上，她悄悄地对我说，她从头到脚这一身装扮，都是柳琴送的。但谁能想象这样一位克勤克俭、节衣缩食的老人，当年与萧

这次路过合肥时见了作家苏北，承蒙他招待并赠送一套他的作品集，十分快慰。归来翻阅他的著作，那一篇篇深情回忆他与汪曾祺交往、受汪先生亲炙的文字，温婉迷人，十分令人钦慕。

众所周知，苏北是汪曾祺晚年的人室弟子，与“老头子”和汪家人都“混得厮熟”，受到汪老的指点后在创作上有明显的精进，乃至在行文中有时也能看到汪氏风格。可以说，没有汪曾祺就没有后来的苏北。苏北很早就认识到汪曾祺在文学上的创造性价值和之于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在结识汪老之前，他就将汪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晚饭花集》一字一句地抄录在笔记本上，结识以后更是一直追随和学习汪老。汪老仙逝后，苏北还常常“忆·读汪曾祺”，真可谓“一‘汪’情深”，令人感佩。

我也是很早就读汪曾祺的。大约是1981年，我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一册1980年第十期《北京文艺》，上面刊载了汪曾祺复出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受戒》。我当时虽然只是一名乡下的初中学生，读完之后也有一种“惊艳”之感。我甚至觉得那整本杂志只有这一篇文章活生生地立了起来，在我眼前上演了一出活剧，从此再也不会把它忘记——这就是一篇好文章的魅力吧。我还记得小说中小和尚唱的那首带一点“荤味”的歌谣“姐儿生得漂漂的”，写出这样一个小和尚的爱情故事，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有些“惊世骇俗”。现在想来，汪老对突破旧套、解放思想是作出了贡献的。后来，我还读到了他另一篇名作《大淖记事》，也觉得十分隽永有味，从此汪曾祺这个名字便在我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

在我读书的人民大学我还见过他一面，准确地说，只是比较远地望见他。

那应该是1993年冬或1994年春天的事，确切的日子记不清了。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钟，我上完自习回宿舍路过一幢教学楼，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外，看到里面灯火明亮且坐满了人，连过道、走廊里都挤满了人，而讲台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矮小的老人。我心知这是在搞讲座，但不知是谁在讲、讲什么，于是向门口一位听讲的同学打听，他告诉我是汪曾祺在讲新时期中国文学和自己的创作。哦，是汪曾祺！我费力挤进了教室，定睛一看，一个黑瘦的老头儿坐在讲台

乾一起，把历时多年翻译《尤利西斯》所得的四万多元稿费，悉数捐给了国家。

我收拾好满满的两大手提袋书，正准备告辞时，文洁若忽然叫道：“张昌华，慢走，我送你一件萧乾的遗物要不要？”我忙不迭地说：“要！要！”只见她手捏一串钥匙，颤颤巍巍地走进卧室，打开老式衣柜上挂的小锁，从柜中取出

我只遥遥望见过他

李成

上，半蜷缩着身子，脸上几无表情，似乎在听底下某个同学提问；而他的面前还放着一只拳头大的陶壶，不知那里面是装着茶水还是装着酒，我猜想很可能是酒——我似乎读过有关他爱酒的文字。因为来得迟，我赶上的只是讲座尾声的交流互动阶段，又因为离得远声音小，听不清楚，所以我便失了兴致，转身退出。但因为有这么个讲座，见到了我闻名已久的名人，我感觉这个夜晚有了微微的暖意，连空气也格外清新。

我后来一直搜罗汪老的作品来阅读，而且越来越喜欢。2008年前后，我购买了收录他作品最多的八卷本《汪曾祺全集》，这样，手头总算有一套比较齐全的汪老的著作了。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想编几本汪老的著作出版。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被我等到了，我与汪老的女儿汪朝老师取得了联系，随后编辑了一本《汪曾祺游记选集》。我写了编后记也写了书评，表达了我对汪老的敬仰和对他的文字的迷恋。接着我又编了一本他的《小说自选集》，后来又编了《汪曾祺精短篇小说》。其间承蒙汪朝老师补充了她新发现的汪老的旧作，使这些书不仅仅限于“炒冷饭”而有了新内容，这是我要衷心感谢的！

每次去汪朝老师所住的高知楼，坐在她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客厅，我都百感交集，后悔过去没有能够多亲近汪老先生，哪怕跟先生多说几句话也好啊！幸好还有他的书在，他那独具风采的魅力也将永存世间。

一顶深蓝色的毛线绒帽递给我，说：“这是当年我给萧乾织的。”我瞥了一眼她头上的帽子，颜色式样差不多。我把帽子握在手中，感觉轻轻的、暖暖的，很舒服。为讨老人开心，我装萌把帽子往头上一戴，有意在她眼前晃了晃。文先生笑着说：“挺好看，挺好看。”忽而又补了一句：“这可不是右派的帽子。”